

客居忆往

——哲学人生问答录

洪汉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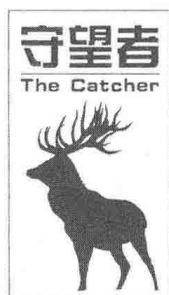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细数学林旧事，再现贺麟、冯友兰、伽达默尔等大家风采。

分享人生感悟，慨叹悲情、低调、孤独中的乐观、进取与奋斗。

■ 德国洪堡奖学金获得者

■ 二战后迄今我国唯一获得德国哲学名誉博士的学者



客居忆往

—— 哲学人生问答录

洪汉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洪汉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300-22801-3

I. ①客… II. ①洪… III. ①洪汉鼎-自传 IV. ①B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384 号

客居忆往
——哲学人生问答录
洪汉鼎 著
Keju Yiw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1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自1999年开始，大略11年间，我在台湾先后任教于中正、佛光、世新、成功和“中央”诸大学。2013年上半年是我在台湾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我离开台湾杏坛前两个月，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关启匡、陈嘉骏和林柏宏诸博士生要对我进行专访，同时参加的还有世新大学的王立业、李玉馨，台湾“中央大学”的李哲欣、谭宇权和政治大学的李彦仪。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和盛情，我在此两个月与他们作了共十余次访谈。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

我一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坦的。1938年出生在日本侵略铁蹄的炮火声中，襁褓中的我就和家人逃难到贵阳。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回到了南京，但不久国内战争爆发。当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我随家迁到江苏无锡。1951年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我终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此期间，也引发了我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美好的前程似乎翘然已待。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忱投入哲学研究时，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悄然降临。偏重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在当时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年方19岁的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劳动。在斋堂艰辛的劳动中，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斯宾诺莎的教导“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

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撑了我继续研究和生活。

1960年，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然而，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仍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监督、疏离和歧视，以至于在1963年毕业之际，在已经唯一地通过从英国回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学甄选的情况下，仍然由于右派身份而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拒绝录取。最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咸阳专区永寿县工会，承担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我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并先后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劫难，工作也从学校到农村、工厂，甚至当过采购员。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治学热情，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我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命体验中，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我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我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我在该年顺利地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不到9个月的修读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并担任了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自己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开端。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我还勤力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出版作最后准备。

但是，正如有人说的，这种提前毕业于我并不是福而是祸。正当我准备在哲学上发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是政府研究机关，主要为政府政策服务，它没有研究生院。在这里，我不仅失去了很多学术资源和条件，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自己感到最大不幸的，是没有培养自己的学生。

不过，这一切并未阻碍我继续研究哲学的决心和毅力。1983年，我获

得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进修两年。重点研究的课题是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德文）在德国出版。其间还与德国教授 L. Geldsetzer 合作编写了中德对照本《中国哲学辞典》（三卷）。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作出贡献，我于 1984 年 10 月受到时任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1991 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头衔，这是德国二战后授予中国学人的唯一一个哲学名誉博士；1992 年又获得国务院认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德国的学术深造使我在此后 30 年以传介和发展诠释学为核心。1990 年后，我多次赴德国、我国香港等地讲学。2000 年退休后，赴台湾地区各大学讲学十余年。1994 年，我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 年，我的译著《真理与方法》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学术上我是很低调的学者，没有像别人那样要创造什么新体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条艰辛地传介和重构当代主要哲学倾向的路子。台湾学生曾问我，到这个年龄我对于自己的哲学自我评价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走的哲学之路不是纯粹创造性的路，如有些人自认为的那样，而是重构过去哲学之路；但这一重构又不是原原本本地重蹈过去哲学的老路，而是希望通过解释过去哲学提出一种创新之路，也就是重新回复过去而创新。这一进路就是我所理解的诠释学之路，我认为这是我们许多哲学家所走的路。孔子说述而不作，就是指解释而不创造，创造是圣人的事，我们作为人只能够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也不是纯粹的复古守旧，而是一种新时期的创造行为。

有人曾以“事件型文人”和“作品型文人”来描述当今一些文人，说“为数不多的事件型文人，总能以自己弄潮儿的天赋，占据舆论制高点，遂使那些埋头写作、性格内敛的作品型文人日趋门庭冷落”。当然，后者原本就为数寥寥，更不用说，这里所说的作品是指堪称真正作品的，而不是指那些哗众取宠，毫无独立见识的东西，后者在今天的书摊上比比皆是。如果作品是指真正称得上作品的作品，那么我自认为自己就是这种作品型的文人，而不是那种弄潮儿的事件型的文人。在这里我想起友

人李幼蒸先生对利科哲学所作的评价：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这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相互分歧或对立的认识论张力关系勇聚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可能利科这一方向正是我的方向。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我始终注意当代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欧陆理性论哲学与英国经验论哲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现象学与诠释学、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综合。

当然，我的一生是充满不幸和挫折，以致非常艰苦的一生，我始终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形式，说某人感到孤独，就等于说某人已经受到伤害，但是，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种孤独只是单独的一个方面，即它脱离朋友，被朋友圈遗弃；可是如果从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来看，单独又是一个哲学家所走的路。伽达默尔曾说，海德堡的“哲学家之路”并不是因哲学教授而命名，而是那些具有历史感的单独之人经常散步的道路。哲学家想借此同以往的时代取得一种内在的联系，自由而独立地思考，寻求自然的内在精神。歌德曾说“谁曾经历过单独，啊，他就将一个人生活”。单独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魅力，它几乎能唤醒一种醉意，使人神往。黑格尔曾说，并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这并不是因为奴隶把主人置于享受的锁链之中，而是因为与依赖于奴隶服从的主人相比，奴隶总是具有更高的自我意识，亦即具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意识，他在劳动能力中发现了自己的意义。

悲情、低调和孤独，这是我的基本特征，但也不完全就是我的唯一特征。在此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同样有乐观、进取和奋斗。我经常以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榜样。斯宾诺莎沉着而冷静地面对苦难，不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而费希特则始终激情而乐观地投入生活，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把他们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静与动、阴与阳、柔与刚的完美结合，如此，在人生幸与不幸、顺与逆的过程中就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幸喜老天对人是公平的，尽管我很长时间内受到不幸的遭遇，但老天给了我一个较好的身体，使我在耄耋之年还能著述和讲课。

本访谈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个人从中学时代到现在的种

种经历，幸与不幸的交集；第二部分是我的老师的情况以及我对哲坛的一些看法；第三部分是我过去所写的回忆文章的汇集。

访谈录不同于回忆录，回忆录可能按历史时间的顺序和个人事件的次序进行撰写，而访谈录却是按照访谈人的提问进行回答，因而文字的组织可能有些纷乱，时间也可能会倒错。尽管我在最后审稿时作了较大的修改，疏漏可能仍然存在。另外，所谈的事件主要是从我个人的体认和理解出发，有些可能有误，在此再次恳请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中的注释大多为陈嘉骏博士所加，在此表示感谢。本访谈录在最后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干春松、唐文明诸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洪汉鼎

丙申年春节修订于北京怡斋

目 录

第一部 苦难与奋斗..... 1

第一讲 家庭和中学时代	3
第二讲 北大记事	21
第三讲 反右斗争	45
第四讲 陕西十五春秋	67
第五讲 重回北京	81
第六讲 德国之行	100
第七讲 台湾讲学	135

第二部 哲坛与问学..... 173

第一讲 贺门子弟	175
第二讲 学问经世	212
第三讲 格义与诠释	233
第四讲 中西诠释比较	266
第五讲 哲学建构	302
第六讲 学术事业与期望	333

附 录 359

春蚕到死丝方尽——记冯友兰老师 361

贺师与斯宾诺莎 366

回忆洪谦教授 374

我和苗公的斯宾诺莎缘 384

我和商务印书馆 387

我和维特根斯坦 394

世纪哲人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 400

学生访记——2013 年上学期末我们访问了洪汉鼎老师 408

第一部 苦难与奋斗

第一讲 家庭和中学时代

两岸抉择：留在大陆

关启匡：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首先请老师谈谈您的家庭和早年的求学过程，有请！

洪汉鼎：1938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那是一个烽火连天的战争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我国的领土，先是东北三省沦陷，随后淞沪战争爆发，苏州、无锡失守，南京沦为孤城，国民政府不得不大举撤退居民。我们家就是在这民族大灾难中背井离乡、逃到贵阳的，当时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在1945年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我们家也就返回了阔别多年的南京。人们原想这下可以安居乐业了，谁知不久后国内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终于在1949年彻底失败跑到台湾，我的家庭不得不面临一种何去何从的两岸抉择。

解放前我父亲在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工作。我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一个部门的书记员。1949年，本来我父亲要随总统府人员先到台湾，暂时把我们安置在无锡姑妈家；但在我父亲要去台湾前夕，我母亲突然变卦了，她不愿意我父亲只身到台湾而把我们留在大陆，因而她带我去到上海。我当时只有12岁，记得父亲与国民政府一些公务人员当时住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附近一所公寓里等待船或飞机到台湾。我母亲找到我父亲后就

不顾一切拉他一起回到无锡，从此我家的生活就发生很大改变。人生有些关键的“一瞬间决定”，这一决定就会使你或你家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一次看见成中英教授写的自传，发现他家在解放前的几次变动都与我家相仿。他父亲也是在总统府工作，当然他父亲是大官，是知名人物，不像我父亲只是个无名的小职员。抗战时我家到贵阳，他家到四川；抗战胜利后我家回到南京，他家也回到南京；解放前夕我家到无锡，他家到杭州；后来他们家去了台湾，而我家本也是要去台湾，只是最后临时决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从此我们两人的命运发生很大差别，各人走着自己不同的道路。

家庭生活艰辛

王立业：当时老师家的生活境况怎样？

洪汉鼎：我父亲留在大陆，不想这就给我们全家生活带来了很大问题。我们原先以为无锡我姑妈家可以依赖，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她们家早已败落，结果只能暂借住到她的一位亲戚家。那位亲戚是粮商，原先他们以为我们家可能很有来头或有钱，故收留了我们；但后来知道我们的窘况，就不让住了。不得已，我们就在我姑妈的另一个亲戚家里租了一处平房。父亲因为以前是给国民党工作的，所以在无锡就没有工作。尽管父亲处处小心，生怕别人知道过去在总统府工作过，但在大陆，这是不可能隐瞒的，不久后他就被传唤到当地派出所登记，行动受管制。

这样我们家在解放初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家里只能靠过去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些金银首饰维生。我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从贵阳转到南京时，我母亲曾把一些金戒指缝到我的小棉背心中，后来在无锡因为没有任何收入，就靠变卖这些金银首饰来维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每隔一段时间，我母亲就拿一个首饰去当卖。

当这些首饰被卖光后，我家就靠父母为人做布鞋维生。我母亲在无锡

中山路摆了一个小摊，不过几年之后，所谓公私合营^①，我母亲就被合并在一个小店里当店员。当时我家住在中山路188号，记得隔壁不远就是无锡有名的三凤桥肉骨头店。尽管肉香引起极大的食欲，但我们只能闻闻香味充饥。我每天都看到父母为了全家生存，一早就去设摊，然后母亲守摊，父亲马上回来，不仅要在家做鞋，而且中午还要做饭，做完饭安顿了我们后，还要送饭给我母亲。

我现在特别痛感当时父亲内心的悲哀。他是一位文人，一直是坐办公室的，能写一手好字，现在却要受如此煎熬。为了生活，我父亲的处境完全改变了，身体变瘦，背也驼了，他整天疲于奔命。我现在还记得他写的蝇头小楷，是那样的美而秀丽，我是根本写不到那样的。我特别记得，他的手巧不仅表现在写字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做的手工艺品上。每到正月十五时，他为了添补家庭生活，都会亲手扎了许多精美的灯笼来卖。什么兔子、狮子、螃蟹，什么都有，而且更美的是好几个小孩玩的龙灯，它有头有尾，记得我与弟弟常和隔壁家的小孩一起举着龙灯来回跑。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真是学艺兼优，相比之下，我真是逊色太多了。

天伦之情深至痛

王立业：老师，在您的斯宾诺莎书里，谈到对您母亲的深厚感情，此时您母亲一定也非常辛苦。

洪汉鼎：对，虽然相对于父亲，母亲的苦可能要轻一些，一方面她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文化内蕴，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另一方面家庭的重担一直是我父亲扛着，她只是一个帮手。在解放前由于父亲有工作，她生活还比较轻松；但解放后，她同样要分担家庭重担，每天一早去设摊，晚上才回。但不知怎么，我对我母亲的感情自小时候起却特别深，这可能是她最

^① 1954年，大陆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意在将以前的民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以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政策。

爱护我和最宝贵我的缘故。特别是大学毕业后，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家庭的温暖，我特别恋家，总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待在母亲的身边。母亲也非常担忧我的一切，我后来被打成右派，她不知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她也不相信她这个儿子会是坏人，她默默地祈祷我会得到平反。我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自序》里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1963年）在去大西北报到之前，我转乘火车回到无锡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母。自从被打成右派后，我再未见到他们。记得当时我只简短地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再不要期待我这个不肖的儿子。我很能体会老母的心情，她对我很早就有一种自豪感。上中学时，我品学兼优，曾为她赢来不少安慰，她盼望我将来有突出的成就。她整天不停地为人做鞋，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造就成一个有出息的儿子。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心爱的儿子成了一个右派，她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但她不甘心死，她盼望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不是事实。当我看到老母斑白的头发，我情不自禁地大哭了起来，我知道，她所忍受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更大，那是一种心灵被绞割的痛苦。至今我还记得在无锡火车站她目送我踏上去大西北的火车的情景，她那瘦弱的双手颤巍巍地高高举起，银丝般的白发随风飘扬，深陷的双眼透出期待的目光与我道别。我不忍回头再看她了，我背转身走进了车厢。也可能是命运，我母亲活到了15年后我重新回到北京，并得知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位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据说1979年她去世时，手里还紧握着《光明日报》当年6月发表的那篇有关我的报道。

1949，骨肉离散

李玉馨：听说老师还有一位哥哥在台湾，能告诉我们吗？

洪汉鼎：这是我家的一个大不幸。刚刚说到1949，我想到了龙应台写的那本《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的确把我们两岸有些家庭在这一大灾难



1947 年大哥去台湾前结婚照

年的莫大痛苦表露出来了，但是我觉得龙应台的体验还是不够，我的亲身体验可能比她深很多！龙应台的父母虽然在来台时是分开的，但最后她家还是在高雄团聚了，而且还生下了她，因此她家并未骨肉离散，可是我家却真正骨肉离散。上面说了我的父亲本来要随国民政府于 1949 年迁台湾，后来由于我母亲感到全家人这样分开不行，就开始打退堂鼓了，觉得父亲为什么要只身到台湾去？要死，全家人也要死在一起！因而最后我父亲终于留在大陆。

可是，我的大哥却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分配到台湾。情况是这样的，1947 年底，我大哥从美国华盛顿大学毕业回来，他向南京教育部报到后就直接被分配到台湾，我想这可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打算要迁台，有意识地要把一些人才往台湾分配。可是我大哥这一走，就使我们与他再不能相见，竟成永别！我家不仅在两岸紧张时期无法联系我哥，而且即使在开放改革时期，也无法打听到我哥的消息。为此我家不知受到多少痛苦，成为一个破碎的家庭。特别是我母亲在心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只记得我母亲经常偷偷地翻看一张我大哥在美国毕业的照片和一张他在去